

尘封的来信

李莎你好，

每当你在微信上问起我是否还想对 lockdown 的体验说点什么时，我总要挣扎地自责一番。这种自责大部分是源于我的拖延。我很清楚这种令人不适的拖延症已经在新冠疫情之后，越来越成为我工作中的一种摆脱不去的事实。时常让我想象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后，年轻人问起我在这段特殊时期里做过些什么事的时候，我只够勉强回复说：我试着重新整理我的头脑，但好像不是很见效……；而另一部分的自责则是觉察到自己对这段日子的那些细节的迅速淡忘。如果不是这份邀请，这一年中的许多体验可能也就散失在生活和工作的琐碎之中，再难有聚合起它们的理由。

还记得在我第一次看到“封城来信”（Post from the 1st Lockdown）的网站后，有个挥之不去的一个想法是：如果比较那些在疫情高峰期大量产出文字和图像的公共媒体，自媒体作者，作家和哲学家，艺术工作者的社会观察和公共分享，该是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讨论艺术的危机，还是该放在整个社会事件的背景中，帮助我们暂时忘记群体特殊性的机遇？艺术工作者们虽然全心全意地向往生机和理想社会，追求身体和精神解放以及对习俗和主流心态的花式脱身，但在遇到这样逃无可逃的整体灾祸时，也必然也会催生出这样或那样的社会伦理意识，因为这些表达的产生也是源于具体的城市与社区处境。

不要说面对这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的全球大瘟疫，艺术家实属社会人群中抗风险能力倒数的群体。普通人可能遇到的人生事故和不幸，发生在特别信奉个体存在价值的艺术工作者身上，很可能还会引发骄傲感、想象力和生活方式的坠落和破碎。可能正是这些难以承受的痛楚，才是艺术工作者面对公众表达时，真正希望传递的东西。

我们总是愿意相信有些事已经是历史了，但它们真的可以再次回来轻易占据我们对未来的感知。例如，我在疫情发生之后做过几次有关政治坐标系在线测试。那些问卷的结果让我看到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复：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比我想象中小很多。虽然在理智上，我能理解这是对疫情期间畅通无阻的威权管制措施以及中国在外交上再次滑向孤立境地的情绪反弹，但我还是有一种即将回到 2008 年以前的社会知觉中去的担忧。

可能是困扰于这种混沌感，在疫情高峰之后，我开始对自己手边的阅读材料做了从未有过的，正统意义上的学科归类。希望在自己偏爱的当代艺术议题研究之外，分拣出知识和观念的来历，也询问困扰我们生活感知的事物中，有哪些已经被社会科学中的人文主义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和媒介传播学等解释通透的，哪些还不能？恐怕只有面对自己的无知，才可能去体会逆全球化的浪潮与中国本土流行的极右翼色彩的语汇的背后，是否真的共享某种社会现实？还有如，今天人们在社会和政治愿景上的对峙和冲突的加剧，是不是还能依靠经济分配的措施来缓解？参与中国的网络基建的企业，在配合地缘政治和挖掘消费潜力之外，是否还有留有面向家庭以及城市生活的技术理想？

在我自己的现实中，这一年多来，人在家庭中的时间大大增加了。但我实在说不清这是因为我在一所大学的新工作以及我父亲的病情让我更少有时间出门，还是因为疫情的起伏让我在心理上对旅行增加了更多的风险意识。这种长期居家的状况也让我看到许多值得细查的新日

常：比如硬件产品的热销和涨价同步于“家庭办公”的概念营销；网络买菜让人习惯了对形体尺寸和重量单位的判断失准；网络讲座总是很难形成牢固的知识记忆；VPN 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大规模中断，反而更加稳定且高速了；我们社会普遍模糊和混沌的思想特征与日益清晰的个人数据或是同构的关系；新冠让大数据的社会监管部署提前曝光，而故事的另一边是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让数字艺术创作成为了实践去监管化的金融工具，让我想象拥有数字艺术家创作的数字作品，或许是某些人实现肉身自由的现实动力；以及，不得不习惯于自我保全的中国年轻人，看似会在 21 世纪变得更认同宿命。

尽管情况的发展令人焦心，但我仍然期盼一个单数的世界会被更多人所认识。这一年来的各国防疫和疫苗竞赛、普遍遭遇的隔离与创伤应激反应、还有对数字化生存的尝试和由此引发人文忧虑，都为世界各地的社会成员第一次真正提供了一段“环球同此凉热”的历史经验。也许，人类在未来能放下些猜忌和偏执，愿意看到些彼此皮面之下的苦难，而今天这些不堪的时日或能成为重新校准世界的那个锚点。

顺祝健康快乐！

辛夷